



辽西蒙古贞地区消弭与复兴中的 蒙古族敖包文化

王静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始, 各蒙古地区曾经一度中断的敖包祭祀活动大有恢复之势。近年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风起云涌更为敖包文化的复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代契机。本文选取辽宁省西部的蒙古贞地区为田野调查地点, 试图探讨蒙古民族的“敖包文化”在生活方式与时代变迁的洗礼中, 经历了怎样的中断与恢复, 其内涵、社会功能及意义发生着怎样的演变, 并如何以崭新的面貌融入到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中, 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蒙古贞敖包文化。

关键词: 敖包文化; 复兴; 文化变迁

Interruption and Revival of Mongolian Aobao Culture in Mongolchin Area of Liaoning Province

WANG Jing

School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Aobao Memorial Ceremony in Mongolian areas which had been interrupted for around 60 years is reviving. Recently, the idea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rvation offers a good opportunity of the revival of aobao culture. This paper reported the situations of the aobao cairns and aobao festival in the Mongolchin district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discussed the transform of the aobao culture along with the life style and society.

Key Words: Aobao culture; Revival; Culture transform

敖包, 是游牧先民草原文明精神衍化的物态形式之一。在蒙古民族长期“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中, 敖包及其祭祀活动曾经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及作用。“文革”期间, 随佛教遭受迫害, 全国大量的敖包被毁坏, 祭祀活动从此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 各蒙古地区的敖包祭祀活动逐渐呈现出复兴之势, 敖包文化的各种相关研究主题也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学界对诸如敖包的起源和内涵, 敖包祭祀活动的功能及意义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思考和探讨。

本文以辽西蒙古贞地区为例, 试图探讨历经生活方式与文化变迁的洗礼, 蒙古民族的敖包文化在其内涵、社会功能及意义上发生着怎样的演变。同时, 随着今天各种时代性元素的不断糅入, 敖包文化又将以怎样崭新的面貌再次融入到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中。

一、蒙古贞敖包现状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俗称“蒙古贞”或“蒙古勒津”。地处辽宁省西北部, 位于医巫闾山之北, 库昆河(今北大河)之南, 伊克翁格勒古山(大青山)之东, 饶阳河之西。早在12世纪, 这片辽阔而丰饶的土地上便有蒙古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7世纪中期, 该地区开始逐步进入畜牧业伴有农业的经济形态。18世纪20年代起, 随山东、河北等地流民进入垦荒种田, 该地区的农业耕地增多起来, 经济形态逐渐由半农半牧向农业过渡。20世纪初, 蒙古贞地区已基本完成这种经济形态的转变, 进入“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方式, 该地区的蒙古族也因而被称为“农耕蒙古族”。于是, 在经历了从游牧到农耕的生计方式的历史转变过程中, 在经历了蒙、汉民族杂居相处的漫长岁月里, 蒙古贞文化逐渐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及民族性特征。

在蒙古贞地区, 历史上曾经有敖包280余座, 遍布三十余乡镇, 二百余村屯。敖包种类繁多, 从结构上划分, 有孤敖包和十三

敖包：从参加祭祀的人群、属地上来说，又可分为旗敖包、村落敖包、家族敖包、姓氏敖包及寺庙敖包。康德十三年至“文革”期间，随佛教不断遭受迫害，敖包数量骤减，迄今为止保存相对完好的敖包仅有 20 余座(以上数据参考[1]，并结合本人的田野调查)。据载，蒙古贞地区历史上的敖包祭祀活动约达 350 年之久，在经历了 60 余年的中断后，21 世纪以来开始逐渐恢复。

本文仅选取招束沟乡乌兰大巴村、大巴镇关山以及大板镇衙门村三个比较典型的敖包为个案，以期对蒙古贞地区敖包文化失落与复兴的历史及现状作以探讨。

(一)在“民众记忆”中残存——招束沟乡乌兰大巴村的敖包

招束沟乡位于县城东北部 35 公里处，全乡总人口约 17000 人，少数民族占全乡总人口的 27.8%[2]。乌兰大巴村位于招束沟乡东南，关山东北。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蒙古贞地区的敖包现状大致为三种：仅存遗址、损坏及保存完好。招束沟乡乌兰大巴村的敖包属于第一种情况。

据当地老人讲述，该村敖包在康德十三年浩劫中遭受到毁灭性破坏。在村民指引下，笔者在该村的一个三叉路口找到它的遗址，该遗址距离当地著名的“一棵树山”较近，据当地民众回忆，该村历史上的敖包祭祀活动正是祭祀这座山的。

历史上，乌兰大巴村敖包所处的地理位置据村较近，这为当年当地民众祭祀敖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此，解放前该村的敖包祭祀活动颇具规模。“那时候，每年阴历七月十三，全村男女老少都早早地来到敖包这儿，把周围打扫干净，敖包前铺上毡子，放上桌子，摆上水果、糕点各样儿供品。8 点多，从山下(指一棵树山)牌楼庙请来的喇嘛开始念经，念完经大伙儿拿着高粱穗、谷穗、香开始转敖包，从左往右转，转三圈儿，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一通儿下来就有 4 个多小时左右。然后大伙上河套边上喝肉粥(即猪肉大米粥)，200 多口人，先吃，吃剩下各家分了。”乌兰大巴村敖包祭祀活动的性质属于民间祭祀，因此，历史上每年祭敖包所需的经费均来自村里的“敖包田”。“每

年年初，村里头都召开大会，大伙一块儿研究，从村上的公用地里留出一块地作为敖包田，挨家挨户出钱把这块地买下来，雇人种，到秋天打粮的钱用来祭敖包。”(根据乌兰大巴村村民韩宝生口述资料整理。)

迄今，乌兰大巴村的敖包祭祀活动已经中断了六十年，但在笔者的走访调查中，却发现当地民众似乎并未对此表示出太多的惋惜和留恋，反而更多谈及到了曾经敖包所祭祀的对象“一棵树山”。

在距乌兰大巴村不远处是关山的东峰，山峰上生长一棵一千多年的枫树，八十里外都能看见，被称为“千年古枫”，当地百姓称它为“一棵树”，这座山峰也因此得名“一棵树山”。(蒙古贞地区在辽代，是辅佐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打天下的北府宰相肖阿古只家族的居住地。契丹族迭剌部耶律家族中的阿保机当选为夷离菑，趁唐朝衰败之时，南征北战。公元 903 年，伐女真路经蒙古贞，看到农业遭受旱灾，在肖阿古只的请求下，阿保机在关山东峰亲身栽种“五角枫树”一株，谓之“求雨树”。)“平日里头，谁家有个难事啦，有个病有个灾儿的都去(一棵树山)，祭拜的人要在树上系红布条，然后许愿，就能消灾去病，保平安。去的人可多了，灵！你要是上去看吧，一树的红布条子。”(根据韩宝生口述资料整理。)

可见，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一棵树”早已被奉之为“神树”加以崇拜。于是，敖包祭祀活动曾经祭祀的对象便成为了当地民众生产、生活中替代的精神寄托，而敖包祭祀本身所承载的精神内涵随祭祀活动的中断而逐渐淡化，只剩下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还残存在当地老人的回忆之中。据笔者田野调查，目前在蒙古贞地区，许多相对保存完好的敖包也都与乌兰大巴村的敖包有着相同的现实命运。

(二)从“名存实亡”到“旧貌换新颜”——大巴镇关山的敖包

关山是雄居于医巫闾山东北终端的一座高山，分东西二峰，座落在大巴镇的西北部，主峰海拔 439.4 米，占地面积 14 平方公里，土壤肥沃，森林覆盖率达 80% 以上，植被独甲辽西。关山在辽代时期叫“黑山”，后来又叫“翁山”。“翁”，古蒙语，意为君王，翁山

意为“王爷之山”。到中华民国年间改为“官山”，意思是官者的山，当时不准许百姓进山。解放后，“官山”改为“关山”，是蒙古贞地区四大风景区之一，被蒙古贞人誉为“圣魂之山”[1]。敖包，就坐落于此山西峰之上。据载，关山敖包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之间，由土默特左翼旗首任旗王爷善巴修建，曾经为蒙古贞地区最大的敖包[1]。关山敖包面南背北，在山峰之上积土为台，主体由乱石堆砌而成锥体(图1)。笔者于2005年8月田野调查中所见的关山敖包高达约2米，底宽约15米。据载，由于关山敖包在历史上的性质为官方敖包，敖包前曾砌有大理石的门楼。此外，在敖包山前原有三座庙，分别为玛日沁本巴惹“确精”(守护神、护法神)庙、成吉思汗庙和关公庙[1]。



图1 蒙古贞大巴镇关山敖包 A.旧敖包, B.新敖包, C. 四周的十二小敖包之一.

Fig.1 The Guanshan aobao cairns in Daba Town of Mongolchin A. old aobao; B. new aobao; C. one of the twelve small aobao cairns circling the new aobao.

据当地民众回忆，解放前，每年阴历七月初二，关山附近的蒙古族百姓都在土默特左旗扎萨克(意为“旗长”)的带领下，到这里祭祀敖包：

“关山敖包是祭佛爷、祭山神的。康德十

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是大祭三年，那时候，祭敖包都是满洲国警察署署长以上的人来参加，还有地主，请的都是高级喇嘛。祭敖包时，穷人就在外头看热闹，外面有卖西瓜、卖烧饼、卖煎饼的。祭完了，那帮署长、国兵、警察和地主吃吃喝喝，咱穷人捞不着。到摔跤的时候可都是咱穷人，地宫、瓢营子、车新的人能摔，出了名的。”(韩宝生口述。)

康德十三年，敖包及其三座庙遭严重破坏，敖包规模减小，三座庙被拆除，敖包祭祀活动也随之中断。而且直至2005年，关山敖包还是“名存实亡”。据当地民众讲述，由于关山敖包的地理位置据周边村落较远，加上关山山路崎岖难行，平日里很少有人前往。只有“一到每年五月节，也不用谁号召，人们自愿上山，山道远呐，不好走，老人们不去，大都是年轻人儿，男男女女，成帮成伙的，蒙汉都有，大伙上了山，啥规矩也没有，愿唱愿跳，愿照相照相。”(韩宝生口述。)五月节一过，关山敖包便又恢复往日的冷清，孤零零伫立于山上，再次遭受冷落。

然而，时隔三年，笔者于2008年8月再次前往关山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昔日里落魄的敖包早已“旧貌换新颜”。为迎接蒙古贞的阜新县成立50周年，县委、县政府责成县民族宗教局和大巴镇政府先后投资50多万元对关山敖包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全面恢复性修建。修复后的敖包气势恢弘，不仅底座直径和高度分别增至36米及18米，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周还各增建了3座小敖包。8月13日，大巴镇当地民众自发举行了修复后的首届祭祀仪式，以庆祝关山敖包的修复落成。但来日方长，关山敖包的祭祀活动是否能够真正延续下去，复兴后的祭祀仪式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秉承传统，仍都是未知。

(三)“复兴”中的敖包—大板镇衙门村的敖包

衙门，在蒙语中是“陵园”之意，因当年土默特左翼旗贝勒亲王在此建陵而得名，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历史。衙门村总人口2142人，其中蒙古族占85%。该村不仅是“阜新蒙古剧”的发祥地之一，还是“阜新蒙医培养地”以及“三祭文化”的故乡之一，堪称蒙古贞文化的一个缩影[2]。

衙门村原有敖包四座，分别位于东衙门

和腰衙门之间的“吉曼皋”西方(即今衙门村村委会前方)、哈日额热根高什树附近、下街北与前往西衙门的三叉路口附近以及西衙门北三百米处(毛其莱峰沟口与辽温特因皋勒沟口相遇之处),其祭祀活动已有 242 年的历史。据当地民众回忆,历史上每年阴历七月十三,各村的民众都会前往各自邻近的敖包进行祭祀,场面蔚为壮观。自康德十五年始,四座敖包相继遭受到毁灭性破坏,主体荡然无存,祭祀活动从此中断,中断时间约为六十年。

2005 年,衙门村敖包在当地民众的呼吁声中,在县政府大力投资下,在腰衙门得以重新修建,2006 年 8 月修建完成(图 2)。新建成的敖包坐落于腰衙门的哈尔其朗山下,占地近百亩,地势平坦、开阔。敖包为圆底锥体,按蒙古语“天地双圆”说,天与地 360°,上下接合,敖包台基为圆坛,直径约 20 米,地下基础部分约为 1.3 米,地面高约 1.3 米。在圆坛之上环叠 13 层石台,呈圆锥体,锥体高约 13 米,底座直径约 13 米,由石头砌成,水泥勾缝。

敖包体上设有两座龕位,下部约二至五层为蒙古族圣祖成吉思汗龕位,上部约七至十层之间为佛龕,意为保护生态的敖包翁衮神。(翁衮:“翁”,古蒙语,意为君王;“衮”,古代君王的礼服。翁衮意为蒙古人用毛毡、丝绸、木块和青铜等材料制成各种形状的神灵偶像以敬奉。)敖包顶部竖立着一个苏勒德立柱,环绕四周竖立十二个苏勒德立柱。敖包顶部立柱与四周按方位竖立的立柱之间的绳弦上系有各种三角形的五色彩旗。在敖包底座正南方向摆有两个小型长方形白色石槽,里面装有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等各种粮食,并插有禄马旗幡、高粱穗、谷穗、麦穗及树枝。小石槽前面放有一个大型白色长方形石槽,里面插满炷香。圆坛四周有 78 根栏杆的白色围栏,台基南北各有台阶两座,正南为十三阶白色石阶,与圆坛下石阶相连,延展铺开与前方不远处祭坛相接。敖包前台阶西侧各竖有黑色大理石石碑,碑文为蒙汉两种红色文字。碑文内容为:

敖包,是蒙古族信仰孛额教敬天而赋予神灵的无比至尊的崇拜偶像。是万众一心战胜自然的象征。崇拜者们祷告长生天,叩拜

敖包翁衮神,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

二〇〇六年农历七月十三日

敖包前两端分别设有一个功德箱。敖包四周新栽有 13 株油松。敖包祭坛为一个两层双圆石坛,祭坛正南设有主席台。祭坛附近辟有赛马场、摔跤场、射箭场。镇政府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把这里与海棠山、三塔沟、白泉寺连成一线,打造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开发区。(海棠山,原名亥台山,属医巫闾山延续山脉,主峰海拔 715.4 米。坐落在蒙古贞大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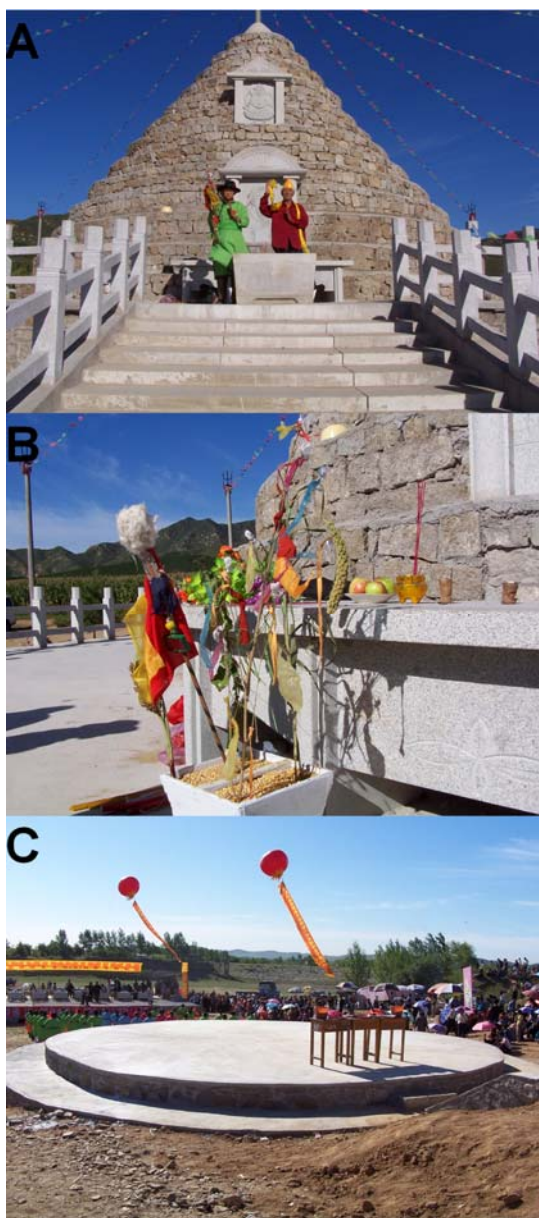


图 2 蒙古贞大板镇衙门村敖包 A.敖包主体, B.敖包前白色石槽, C.敖包祭坛

Fig.2 The Yamen Village aobao in Daban Town of Mongolchin. A. the aobao; B. the white stone trough in front of the aobao; C. altar.



图3 大板镇衙门村敖包节 A.开幕式, B.喇嘛诵经, C.喇嘛转敖包

Fig.3 The Yamen Village Aobao Festival of Daban Town. A. open of the festival; B. Lamas are chanting; C. Lamas are circling the aobao.

镇境内,距市区 22.5 千米。游览区内以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石刻造像堪称中国一大奇观,是全省五十佳景之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森林公园和 AAA 级风景区。三塔沟自然风景区位于蒙古贞大板镇境内,距县城南 25 公里,是海棠山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白泉寺,位于蒙古贞大板镇衙门村北,始建于嘉庆六年即公元 1801 年,属普安寺附庙,是为普安寺四世活佛丹毕道尔吉的避暑院,由旗府出资兴建。2006 年,由居士大德出资恢复修

建。)2006 年农历七月十三,大板镇衙门村历史上敖包祭祀活动正式更名为“大板镇衙门村敖包节”,来自日本国友人、北京、甘肃、新疆、青海、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区来宾及当地邻近 8 个乡镇 30 多个村屯的近万名群众一同参加了敖包祭祀活动。

该祭祀活动自恢复之日起一直延续至今。2008 年 8 月,笔者前往大板镇参加了第三届敖包节(图 3)。当日早 8 点 30 分,衙门村民在敖包前跳起早已排演好的安代舞,同时 26 名喇嘛在敖包石阶上诵经。9 点 20 分村党支书向前来参加敖包节的领导、来宾敬酒、献哈达。9 点 58 分大板镇衙门村首届敖包文化节正式开幕。第一项是喇嘛诵经,熏香仪式。第二项,老年协会会长者向敖包、哈尔其朗山、圣主成吉思汗敬献供品,叩拜敬礼,献哈达。第三项,老年协会会长者分别用蒙汉两种语言向敖包、哈尔其朗山、圣主成吉思汗致祭辞、颂辞。首先,向敖包、哈尔其郎山致祭辞:

唵嘛哄,唵嘛哄

献给至高无上的长生天九十九的酒祭

献给广袤无垠的大地母亲九十九的酒祭

献给普照天下的太阳满九的酒祭

.....

至尊的霍尔木斯塔滕格尔

威震广袤无边的宇宙天空

风雨雷电的筹划者

云雾雷雨的指挥者

请您用射透天体的双眼

俯首观看衙门村的一片天地

给予风调雨顺阳光雨露的美景

降临粮食丰收水果飘香的年景

.....

以敖包翁衮神为首

保佑人间的一切神灵

然后向圣祖成吉思汗献颂辞:

圣明天子成吉思汗圣祖

圣洁无比的哈达捧胸前

母仪天下的哈屯皇后神

口诵祝祷文辞向您敬献

大板镇衙门村全体子民

高举斟满美酒的金樽杯

举行盛大祭典表奏祷文

请接受子民的重视心愿

……

敬献绢丝锦缎的长哈达

让后世裔嗣多福多财禄

叩头跪地膜拜表述心意

让后代子孙生活乐无边

……

接下来第四项，喇嘛们手拿高粱穗、谷穗、树枝等围绕敖包顺时针转三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最后一项，喇嘛诵经并奏经箱乐，敖包前再次跳起安代舞。随后，村民们席地而坐，共享敖包节祭食，分食肉粥。下午 13 点 30 分，“好汉三技”活动开始，赛马场、射箭场、摔跤场一片沸腾，来自各个村落的民众大显身手，跃跃欲试。村民们喜气洋洋，共享节日气氛。晚 19 点 30 分，在衙门村部文化广场举行篝火晚会，文艺演出，并奖励“好汉三技”获胜者，大板镇衙门村首届“敖包节”在一片祥和落下帷幕。

二、敖包文化兴衰的政治原因

从上述的三个田野个案可见，相同的历史命运使得蒙古贞的敖包文化失落了六十年之久，而不同的现实命运又使得该地区的敖包文化呈现出“遗弃”与“复兴”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目前，就整个蒙古贞地区而言，许多村屯的敖包都与乌兰大巴村敖包有着相同的现状，即主体不复存在，只留有遗址。而唯独大板镇衙门村的敖包能够得以重新建造，并成为蒙古贞地区敖包祭祀活动复兴的首例。同时，在现存完好的 20 余座敖包中，同样是主体尚存，大巴镇关山的敖包却能够独受青睐“脱颖而出”，得以修复，并成为蒙古贞地区乃至“天下第一敖包”（此说法系蒙古贞当地政府及各界媒体的说法，确凿与否尚需考证，但就目前所发表的文章、论著显示的数据来看，关山敖包的规模的确值得称道）。同时，在蒙古贞敖包文化复兴的背后，我们还应看到，与传统的敖包祭祀仪式相比，目前该地区复兴后的敖包祭祀活动已是“旧貌换新颜”，而这其中消失了什么，弥留着什么，又重构着什么，失落与复兴，遗弃与“重生”，

蒙古贞敖包文化变迁中所纠结的深刻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博厄斯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3]。在蒙古贞地区，这两种环境因素交织一起，深刻影响了该地区敖包文化的失落与复兴。

首先，蒙古贞各村屯的敖包祭祀活动几乎同时中断了六十年之久，相同的历史命运深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历史上，蒙古贞敖包祭祀活动的司祭人是喇嘛，而该地区佛教的衰落是导致其敖包文化失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民国初年和日伪统治时期起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再到 20 世纪 60 年代当地的“喇嘛教肃反运动”，蒙古贞的佛教不断遭受迫害，寺庙被大肆破坏拆除，喇嘛地位不断下降，人数骤减。“文革”期间，随佛教再次遭受重创，当地曾经幸免于难或残存的敖包被当作封建残余再次大规模拆毁。至此，蒙古贞地区的敖包残存、荒芜于山岭野外，多少年无人问津。

近年来，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风起云涌，蒙古贞政府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及抢救工作。从上述三个田野个案来看，与乌兰大巴村敖包相比，大巴镇关山敖包及大板镇衙门村敖包的幸运之处主要在于得到了县政府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投资，其祭祀活动才开始逐渐恢复，并成为迄今蒙古贞地区现存 20 余座敖包中仅有的两个复兴个案。同时，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还深刻体会到，政府权力的介入有时会激活许多深藏已久的民间记忆：

“六十年喽，每路过那个地方，心里头总是有一个(情感)疙瘩，不好受啊，每到阴历七月初二，我都跟儿子、孙子们念叨：那时候每年啊，一到今儿这日子，全村男女老少都早早地赶去西衙门……老人们要是不提供，蒙语办能知道吗？听说腰衙门要建敖包了，我们老人儿从心里头乐啊，大伙都去送石头，三个、五个的抖松，大的拿不了，小的也拿，老百姓对这敖包有感情。”（根据衙门村村民敖金财口述资料整理。）

“这是百姓心目中深藏永久的记忆，现在修复，这很正常。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向往，

向往美好的生活，祭奠敖包在自己心理、精神上是一种寄托，通过这个对生活充满信心，敖包给衙门带来了福气，衙门地儿风水好，出名医、出人才……”(敖金财之子口述资料整理。)

可见，在文化处于政治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民间的历史叙事和记忆就会受到制约和压抑，民间的记忆与历史也会基本上处于暂时的尘封状态。而一旦这种文化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和叙事声音则会纷纷浮出历史的地表[4]。蒙古贞敖包文化的复兴终归是一场由政府主导、民众参与支持的文化展演活动。

其二，与其它蒙古地区相比，蒙古贞地区的敖包文化复兴活动稍显晚些，进入 21 世纪以来才有所势头，并且复兴的范围相对较小，这与该地区历史上生活方式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蒙汉民族杂居相处的漫长岁月中，蒙古贞古老的游牧文化逐渐打上了深刻的农耕文化的精神烙印，汉民族信仰中的“杂糅性”无时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该地区的蒙古族。于是，敖包文化曾经赖以产生、生存的精神文化土壤发生动摇，敖包文化复兴的动力自然就相对薄弱些。但与此同时，生活方式的变化也给复兴后的敖包祭祀活动带来了许多不同的文化特质。

如敖包的建造更注重外型的审美性特征，无论从建筑材料(如砖、水泥等建筑材料的使用)还是建筑风格(如外形更规则，规模更大，装饰物更丰富，色彩更鲜艳)都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见图 1C)。此外，供奉的对象除了传统的祭天、祭地、祭成吉思汗外，还祭佛、祭观音(图 4)、祭关公，甚至将几者并置一起而共同祭祀。

不仅如此，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还发现，在木板衙门村的敖包祭祀活动上，人们除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吉祥”，祛病消灾、求子、升学及发财等极具个人化色彩的功利性祈求内容也占有很大比重。此外，在祭祀仪式中，除了传统的“男子三艺”外，还融入了安代舞、蒙古剧、篝火晚会等新的艺术形式，并穿插有表彰村里先进个人的内容，祥和喜庆的气氛已使得以往祭祀中的神圣、敬畏色彩悄然淡化。



图 4 敖包上供奉的观音

Fig.4 Avalokitesvara statue on an aobao

三、敖包文化的内涵转变

以色列人类学家唐·汉德尔曼 (Don HANDELMAN) 认为，“仪式”需要在一个具备以下特征的文化世界里举行：“这些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的；宗教在这些世界中乃是无所不包的整体，它由全面而系统分类的大大小的宇宙构成，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均自宗教演绎而来。这些分类方法被视为‘天然合理的’，也就是说不得按照人的意愿加以改变。”[5] 换言之，仪式具有着自身内在的超逻辑，它在一定程度上以“宇宙秩序”为核心，参与仪式的主体要遵从这种超逻辑，不得违背，整个仪式中弥漫着神圣的宗教感，并以此对仪式内部进行整合分类。

在古老的敖包祭祀仪式中，参与者心对自然、祖先神灵的情感与敬畏，试图通过喇嘛诵经、熏香、献祭及祈祷等各种礼仪方式接近神灵，希望其赐恩降福。于是，敖包成为了一个世俗与神圣相沟通的媒介，人与神以“敖包祭祀仪式”为核心搭建起了一个“意义空间”，在这一空间内，每一个礼仪程式都以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及意义揭示了神的世界与宇宙空间的逻辑秩序。

然而，伴随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日益改变，蒙古民族许多曾经根深蒂固的习惯、思维图式、宇宙观念及精神信仰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昔日里敖包文化所建构的“意义空间”正分崩离析。而在复兴后的敖包祭祀仪式中，农耕民族精神信仰元素的日益融入，政府权力介入下经济功能的与日俱增，从“娱神”到“娱人”功能的转变，所有的变化都昭示出一个集祭祀、娱乐及经济功能于一体的新

的“意义空间”正在生成。

参考文献

1. 项福生,吴久富(2007)关山旗敖包与蒙古贞敖包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52-65.
2. 白云(2005)蒙古贞村屯史(第一辑).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语委(内部发行).
3. 博厄斯(Boas F). 金辉 译(1989)原始艺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4. 刘晓春(2004)民俗学问题与客家文化研究——客家研究的普遍性与线性视野之反思.江西社会科学 (1):118-121.
5. 唐·汉德尔曼(Handelman D).仕琦 译(1998)仪式/壮观场面.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3):99-113.